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五編

林慶彰主編

第18冊

南朝儒經義疏之時代特色

戴榮冠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南朝儒經義疏之時代特色／戴榮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5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 18 冊）

ISBN：978-986-322-124-1（精裝）

1. 經學 2. 研究考訂

030.8

102001954

ISBN-978-986-322-124-1



9 789863 22124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124-1

南朝儒經義疏之時代特色

作 者 戴榮冠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十五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3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南朝儒經義疏之時代特色

戴榮冠 著

作者簡介

戴榮冠，台灣高雄人，國立成功大學學士、碩士，現為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候選人。師事宋鼎宗、林金泉教授，並曾赴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研究經學、讖緯、術數學、文獻學等領域。曾在國內外研討會與刊物上陸續發表〈論南朝儒經義疏的形成——以儒釋兩家為對象〉、〈南北經學交流與南朝義疏發展之探究〉、〈西漢卦氣說之天道觀考察〉、〈清代胡安國春秋傳所體現的華夷之辨〉、〈清代論詞絕句論黃庭堅詞探析〉等文章，致力會通經緯，發揚國學。

提 要

南朝時期，屢經動亂，又時代更迭迅速，使得政局呈現內亂、外患並現的情勢，少有長期安定繁榮之時，而經學的發展必須有一定之社會安定基礎，在此時對經學的發展是不利的。又因新興學派並起，儒文學、史學、玄學、佛學等，在當時得到帝王、士族的支持，成為一代之風尚。諸學並立，代表的是儒學獨尊地位之不再，由於帝王的褒獎愛好，使得才學之士紛紛流向新學，對經學發展甚為不利。當時經學所呈現的，乃是內容與體例的變革、重視禮學與經說多元化面貌，筆者探索南朝義疏發展的背景，以窺視經學呈現特殊現象的成因，作為義疏之學論述之準備，是為第一章。

義疏之學，是南北朝時期所特有之經說體裁，本質上即是對各經經注的再詮釋。南朝由於受到時代風氣、傳統經說及新興學派的影響，使得義疏體例異於北朝，由於玄學的持續發展，使論辯談說之風滲入經學之中；佛教的講經與注經，在形式與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當時經學除繼承漢魏以來的解經傳統，同時又受到新的刺激，於是在解經方法上產生了變革，義疏體裁的產生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項目，筆者就南朝義疏產生之原因與體例之特色進行論述，以期能凸顯南朝義疏體裁之時代特色，是為第二章。

義疏之學，除了體裁有別於前代之外，在內容的表現上也同樣具有特色，由於南北呈現分裂狀態，使得雖同為義疏之名，但卻有著不同的發展型態，大體上北朝重師承，篤守漢末鄭玄之學傳統；南朝重創新融通，解經兼采各家，不泥於一家之學。北學以鄭玄之學為主，使義疏發展呈現較為統一的局面，雖然有其他學派與之抗衡，但基本上仍是呈現穩定的狀態。南朝義疏內容則非如此，一方面繼承前代經學議題，如鄭王之爭的延續，一方面博採各家之說，並時有創新之說，義疏內容所呈現的是十分豐富的面貌。南朝各經義疏的共同特徵，在於廣收古今各家之言，並融合南北義疏內容，使經學在南朝進行了內容上的交融。雖然喜好創新之說，並常有謬誤之論，但經說的整體成果，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唐代《五經正義》之作便是融合古今南北經說之代表，《五經正義》的成書，南朝儒經義疏的融通經義則功不可沒，筆者本此脈絡論述，是為第三章。

南朝時期，南北交流頻繁，其中常有經學之交流，因南朝學風好新穎、重融通，故於南北經學交流之時，北方學者之學說、流派流入南朝，在各家論辯的過程中，使南朝義疏之內容得以豐富與深化，這對南北經說的融合有著相當大的貢獻。筆者由史料中尋找南北交流之痕跡，並進一步探究經學交流對南朝義疏之學之影響，是為第四章。

最後總結南朝義疏之學，首先指出南朝義疏體例及內容兼容並蓄、勇於創新的時代特色，此點較前代更為進步，並為新思潮的產生作前置性的準備。其次，論述南朝儒經義疏具有綜括前代經說，並在內容上、體例上具有承先啟後之歷史地位，此為南朝儒經義疏之兩大時代特色，以此總結南朝儒經義疏之時代特色，是為第五章。



目 次

第一章 南朝義疏發展背景.....	1
前 言	1
第一節 儒學獨尊地位之不在.....	3
一、時代的動盪.....	3
二、文學、史學的興盛	4
三、玄學、佛學的盛行	6
第二節 南朝經說發展特色	7
一、新經說體裁的產生	7
二、禮學受到重視.....	8
三、經說多元化.....	10
小 結	11
第二章 儒經義疏體裁的創新.....	13
前 言	13
第一節 儒經義疏產生之因素.....	14
一、佛教之影響.....	14
(一) 義疏文體概說	14
(二) 佛經三分科判對儒經義疏的影響	15
(三) 合本子注對儒經義疏的影響.....	18
二、儒家解經方式之變革.....	20
(一) 漢代經說體裁與儒經義疏之關係	20
(二) 儒家講經方式與儒經義疏之關係	24

三、學風改變對儒經義疏之影響	27
(一) 漢魏學術風氣變革略說	27
(二) 集解體裁與義疏之關係	30
(三) 魏晉義說與儒經義疏之關係	32
第二節 儒經義疏體例之探討	34
一、儒經義疏之解說形式	34
(一) 總括文義	35
(二) 訓釋字詞義	37
(三) 串講句義	38
(四) 補充疏釋	40
(五) 延伸擴展	41
(六) 徵引成說、施加案語	43
二、儒經義疏之解說方法	44
(一) 經說相互發明	44
(二) 問答辯難	46
(三) 經說條理化	49
(四) 直申經注	51
(五) 反注自出	53
(六) 論辨經義	56
小 結	61
第三章 南朝儒經義疏內容探析	65
前 言	65
第一節 義疏內容之解說模式	65
一、以一家之注爲底本	65
(一) 《周易》方面	66
(二) 《尚書》方面	67
(三) 《詩經》方面	67
(四) 《禮記》方面	69
(五) 《左傳》方面	69
二、兼論各家之說	70
第二節 鄭王之爭之延續	73
一、祥禪之制	75
二、天子宗廟之論	77

三、繼母出嫁之服議	78
第三節 經說之深化與創新	80
一、深化與創新	81
二、創新的流弊	91
三、義疏經說之檢討	92
小 結	93
一、章句訓詁與義理之學之轉關	93
二、試驗性強的經說	94
三、適應時代的改變	95
第四章 南北經學交流與南朝義疏發展之探究	97
前 言	97
第一節 南北經學交流概況	97
一、劉宋時期與北朝之交流	98
二、蕭齊時期與北朝之交流	100
三、蕭梁時期與北朝之交流	103
四、陳代與北朝之交流	111
第二節 南北義疏交流及其影響	112
一、《禮記》方面	113
(一) 採用劉宋學者之說	115
(二) 採用梁代學者之說	116
二、《詩經》方面	117
三、《書經》方面	117
小 結	118
第五章 結 論	121
第一節 兼容並蓄，勇於創新的經說及體裁	121
第二節 綜括前代，承先啓後的歷史地位	122
第三節 創新性	123
參考引用書目	125
附錄一：西漢卦氣說之天道觀考察	128
附錄二：南朝經學義疏文獻輯佚出版書目七種 提要	149

第一章 南朝義疏發展背景

前 言

義疏之作，是經說注釋體裁的變革，也是經說內容的變異，它的產生起因於對前代各經說體裁及內容的吸收，以及融通玄、佛學等因子。然而，義疏為南北朝時期所共有之經說體裁，當時之所以需要新興體裁，實歸因於時代的需求。經學自漢末以來，由於政治社會的動盪，使得儒學的發展失去穩定的社會基礎；今古文經說長期的爭論，使得經學的發展漸趨僵化。漢末鄭玄雖囊括古今文，使漢代以來經說得到融通歸納，但卻也無補於此衰微的趨勢。其後王肅等人抨擊鄭玄，以另一種融合古今文的姿態自立門戶，因貴為皇戚而得到官方重視，鄭王之學者各有擁護者，雙方相互攻訐，黨同伐異，成為魏晉經學發展的主要路線之一。漢末在學派流變上呈現的是今古之爭轉變為鄭王之爭，但在儒學發展上卻是一片衰微的景象，《三國志》卷十四魏書十四〈董昭傳〉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註1〕，《三國志注》卷十三魏書十三〈王肅傳〉裴松之引魚豢《魏略》云：「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註2〕，漢魏之

〔註1〕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77），頁442。

〔註2〕 同註1，頁421。

間儒學衰微至此，雖有董遇、賈洪、邯鄲淳等人為當時之儒宗，也無法挽救經學衰微之頹勢。在此同時，何晏、王弼之流以道家思想，重新對儒家經典做包裝，產生新的義理之學，亦即玄學，在當時廣獲人們愛好，一方面則是厭惡僵化的章句訓詁之學，一方面則是人心趨易避難，玄學提供簡便的方法，而趁儒學衰微之時而起，於是流風所及，綜括西晉東晉，以及南朝百餘年，經說皆為玄學影響所籠罩，漢代經說之原意多被蒙蔽。帝王雖欲提倡儒學，然往往為戰亂所阻，於是經學在此一時期呈現常期低迷的狀態。

降及南朝，經學同樣未能興盛，但受到各種新興思潮及解說方法的影響之下，經說一變而為義疏之學，經說重新詮釋的意義，乃在於闡釋舊有經說，使能上接漢魏經學，一方面重新解說以資於治道；另一方面則為經學延續其慧命。但於南朝義疏發展之時，產生了特殊面貌，有別於北朝多半篤守漢代經說，南朝由於前代玄學發達，經說於魏晉時期便已沾染玄學因子，南朝承其緒而發揚之，於經說闡釋中每每可見玄學思想。其次，魏晉以來佛教興盛，佛教因子的滲入，使南朝經說加入佛學的思想內容，義疏體裁的產生也受到佛教深刻的影響。玄學、佛學滲入義疏之中，往往被後人所譏評，但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之思潮，當經學自漢末中衰，直至南朝時期，對經義多已不甚明瞭，經學家為延續經學生命，必須在解說內容及詮釋方法上有所創新，當時玄學、佛學大盛，儒經欲使人們理解，則運用當時流行之思想原是無可厚非，一如佛教初入中國時以格義融入中國思想般，南朝經學衰微已久，欲重新包裝，則必須運用當時流行之思想語彙以及解說方法，於是南朝義疏在內容上呈現出多采多姿之面貌；解說方法上則承接各種經說體裁，並吸收佛教解說方法，形成義疏之特殊體例。南朝義疏一方面延續漢代章句訓詁之學，使人們瞭解經說之原意，一方面則勇於創新，除採用玄學、佛學等因子之外，更於經說上自發新意，新說屢出，雖未必然合於經旨，但卻反映了當時思想的自由活躍，這對各思潮的融合有著正面的意義，也為後代義理之學的發展奠定基礎。

宋、齊、梁、陳一百六十九年間，繼承魏晉以來的分裂局面，此時中國處於極端混亂的局面，當時各種思潮並起，與儒學間的摩擦與融合達到高峰，是繼先秦之後，思想上所呈現第二次群學並起的局面。新興的學派受到當時人們的愛好，如玄學、佛學的興盛，文學、史學所受的重視，這使漢代以來獨尊的儒學發展受到衝擊，才學之士紛紛投靠新興學派的陣營，這對經學的

發展是相當不利的。就南朝帝王而言，雖然多半認同經學對統治的重要性，並在表面上以經學為群學之首，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扭轉風氣，甚至部分帝王本身也將儒學作為王朝點綴的象徵，而非真心弘揚經學，這使南朝前期經學的發展陷入困境，《南史》〈儒林傳〉云：「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註3〕，可說是南朝初期經學的基本寫照。有識之士深感經學之凌遲，對國計民生有不利之影響，於是自晉代以來，儒者對玄虛之學的駁斥，與佛教的爭端，斥文學為雕蟲，是儒者在當時的反撲。經由一連串爭論的過程，也同時使儒學與各學進行交流，一部份儒者對各家之學採取的是調和的態度，於是經說注釋產生了改變。儒家經注受到新興學派的刺激，在體裁與內容上產生變化，其中以義疏之學的出現最具代表性，是儒學與玄學、佛學等交融下的產物，義疏的形式與內容深受玄佛之學的影響。

內容方面，自漢代以來所累積的經注，在南朝義疏中作了總整理；長期與各學派交流中，玄學、佛學等因子深入義疏內容之中；南北交流的頻繁，使得北方經說融入南朝義疏的內容之中，南朝義疏儼然成為當時古今南北經說的大熔爐。又當時時代風氣好新尚異，經說在風氣影響下，呈現新說紛起的現象，這是南朝各經義疏的共同現象，也成為義疏之學的重要特徵之一。以下就當代儒學現象與義疏發展狀況分別作說明，以作為義疏之學的背景陳述。

第一節 儒學獨尊地位之不再

一、時代的動盪

南朝時期，部分君主對經學有著正確的認知，明白經學對統治者的重要性，然南北之間戰禍不斷，加上各代內亂，使得有心君王無法全面推展儒學。自劉裕建國以來，便知經學對政權的重要性，本紀載永初三年劉裕下詔：「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南史》〈禮志〉云：「武帝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未能建立國學便駕崩，儒學的復興受到挫折。其後宋文帝即位，於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並親往視學，使得儒學一時間有復興之跡象，但隨即因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率大軍南下，國學再度遭到

〔註3〕 唐·李延壽《南史》，（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730。

廢除。宋孝武帝於大明五年下詔修庠序，準備復興國學，但接踵而來的，是宗室之間的慘烈內鬥。逮宋明帝之世，誅殺宗室甚烈，又其愛好文學，因而儒學得不到應有的扶持，直至南齊易代，儒學始終無法全面推行。齊高帝即位不久，於建元四年詔立國學，同年高祖駕崩，其事又寢。齊武帝時，復立國學，其時王儉、陸澄在朝，又有文惠太子愛好儒術，經學一時間得到短暫重視，但武帝在位僅十年，其後齊明帝、東昏侯未能繼承，且陷入宗室內亂的局面，經學於是無法進一步推展，所謂「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就史料觀之，並不完全如此，儒學在前期無法得到復興，最主要仍是有心君主早殞、及內亂外患的阻礙，於是經學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

梁武帝在位期間，是南朝經學最盛之時，天監初年武帝於南北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於是幾十年間未有大型戰爭，提供經學發展的穩定背景。梁武帝積數十年之努力，使經學獲得重要成就，然末期侯景之亂，使得經學規模毀於一旦。其後陳朝代立，也無法恢復梁代盛況，《南史》〈儒林傳〉云：「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陳朝創立之初，尚有盜賊內亂，未及勸獎，文帝即位雖有提倡儒學，但卻無法全面振興，之後外患屢見，隨即為隋朝所兼併。南朝經學之所以無法持續盛況，時代的動盪是重要因素之一，除梁武帝時期外，其餘時期皆不足稱，可見當時經學發展受時代動盪影響，而無法穩定發展。

二、文學、史學的興盛

南朝文學、史學的興盛，對經學發展是另一阻礙。南朝文史之學之所以能夠大盛於當時，帝王的提倡是其重要原因，早自曹魏時期，曹氏父子對文史的提倡便不遺餘力。魏文帝以帝王之尊，崇獎著述，欲求不朽之名，《典論》〈論文〉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由於漢末喪亂，戰禍頻仍，文人感己身之忽逝，悲身死而名沒，而文章著述之事，足以流傳後世，因此上自帝王之尊，下至文人之流，莫不以著述為要務。此時正值文學覺醒時期，強調著述以傳世的風氣極為盛行，史學之作與文學同樣，能夠傳世於後，因此兩者在當時常被同時並提，如《梁書》卷四十九〈周興嗣傳〉：「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與

興嗣談文史而已……」〔註4〕，又《陳書》卷三十四〈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註5〕。關於南朝帝王愛好文史的紀錄，史傳、典章之書皆有記載，如《通典》卷十六〈選舉四〉云：「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云：「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註6〕。如前文所論，宋初至文帝元嘉時期，致力於提倡經學，但由於戰爭等因素，而使經學無法得到全面性的推展。宋明帝時期雖居於偏安，但其篤好文史，不思經術，即使在位期間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實際上仍是偏重於文史方面，經學的發展無法得到帝王的真正重視。宋、齊經學得以延續，乃是由於民間及世家的努力，如雷次宗、周續之、劉瓛、吳苞等人開館授徒，孜孜教誨；世家爲其實際利益，對經學中之禮學有所片面的重視，如此使經學得以繼續流傳。《南史》卷二十二〈王儉傳〉云：「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心《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註7〕，齊代延續劉宋崇尚文學的風氣，經學此時並不受重視，王儉獨標經學旗幟，且當時並有高帝、武帝二人提倡，於是經學暫時得到一定的重視。至王儉之孫王承，又回復到重文輕儒的風氣，本傳云：「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從列傳記載中，能夠側面得知當時經學風氣的低靡。

到了梁代，梁武帝雖重視經學，但對文學也深爲愛好，《南史》〈文學傳序〉云：「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搢紳之士，咸知自勵。」〔註8〕南朝經學，以梁武帝時期最爲興盛，勸課教學、獎勵儒術不遺餘力，經學在

〔註4〕 唐·姚思廉等，《梁書》，（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頁697。

〔註5〕 唐·姚思廉等，《陳書》，（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頁462。

〔註6〕 唐·杜佑，《通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頁389。

〔註7〕 《南史》，頁595。

〔註8〕 《南史》，頁1762。

此時不能說是受壓抑的狀態，但武帝在提倡儒學之餘，對當時流行的文學也同樣傾心，由以上君臣間談讌賦詩的情形，則武帝愛好文學的程度可見一斑，所謂「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搢紳之士，咸知自勵」，由於利祿吸引、時代風尚雙重誘惑之下，使才學之士分散精力於文學，對經學的發展仍舊是不利的。《陳書》卷三十三〈沈洙傳〉云：「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註9〕，梁武帝大同年間，學者多習文史之學，而不肯鑽研經學，梁武帝即位之初提倡儒學，使儒學獲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到了後期，由於文史學的誘惑力畢竟大於經學，經學的發展又如同齊代一般，呈現時盛時衰的景象。其後如陳後主愛好文學，《陳書》〈文學傳序〉云：「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字勵矣」，對文采辭工之徒加以賞賜，《梁書》卷十四〈江淹、任昉傳〉云：「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註10〕，足以說明南朝以來重視文史之學的現象。另外，南朝文史並舉，可從當時文人傳記中得到訊息，如宋謝靈運、梁沈約、陳阮卓、傅縡等，並以文學知名，而謝靈運曾奉命修纂《晉書》，沈約乃主編《宋書》，阮卓曾任著史學士，傅縡曾任撰史學士，文筆精良之士，每授以史官，可見文學與史學在當時被視為同流，同樣受到帝王的重視。

三、玄學、佛學的盛行

自魏晉以降，玄風大盛，貴族、文士每以談說爲務，多無心於經術，《南史》〈儒林傳序〉云：「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此時師法既壞，又乏帝王勸講儒術，經學發展是以衰微。自永嘉喪亂以來，士人疾呼清談之誤國，玄學之風暫時遭受壓抑，然士族談說已成習性，又江左兼山川之美，易啓人玄思，玄學在地利、人和下又復興盛，終南朝百餘年，玄學之風未能斷絕。玄風既盛，《二十二史劄記》〈六朝清談之習〉云：「當是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五經中唯崇易理，其他盡闕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爲談辨之

〔註9〕《陳書》，頁436。

〔註10〕《梁書》，頁258。

資」，這很能說明玄學的興盛為何阻礙經學發展的原因了，《易經》受到重視也只反映了談辨之資的需求，梁武提倡儒學，雖有振興之功，但此時經學已受玄學深刻影響，未必全然是經國致用之學。

其次，佛學盛行於南北朝，對經學發展同樣產生不利的影響。帝王公卿信仰佛教者甚眾，宋時如武帝、文帝、孝武帝；齊代則高帝、武帝、文惠太子、竟陵王等人崇尚；梁代則武帝時期，將南朝佛教信仰推至高峰；陳代則武帝、文帝、後主。綜觀全部南朝，大半帝王對佛教皆甚為傾心，而佛教理論中與傳統儒家思想多有齟齬，由何承天、劉孝標、顧歡、郭祖深、荀濟、范縝等人與佛教的衝突中，足見儒學本身與佛教存在著相當大的矛盾，但統治階級的態度卻多偏袒佛教，使佛學在數次衝突中更為壯盛，在彼此勢力消長之下，對儒學的發展有一定的阻礙。又崇佛風氣盛，使許多人才投入佛教陣營，無形中削弱了儒家陣營的力量。清人馬宗霍云：「然武帝晚耽禪悅，信道不篤，自三度捨身。於是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疏，尋遘亂亡，聖業用替。南學之所以卒未大昌者，斯蓋其一因也」，梁武帝推行儒學功冠南朝，然其晚年耽溺佛教，使長期經營的儒學事業告於停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南朝儒學之多舛令人惋惜。《二十二史劄記》〈南朝經學〉云：「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為重，故習業益少」，這說明了文學、史學、玄學、佛學的興盛對儒學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第二節 南朝經說發展特色

一、新經說體裁的產生

南朝時期，經說受到新興學派的影響，如玄學、佛學、文學，使解經體例上產生了重大變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義疏」一體的產生。義疏一體最大的特色在於其產生的過程，深深受到佛教、玄學的影響，其敷座講演，廣論眾說，並藉由論難者反覆問答的過程，加以文字的紀錄，便是義疏產生的基本形式，清人馬宗霍云：「緣義疏之興，初蓋由於講論。兩漢之時，已有講經之例，石渠閣之所平，白虎觀之所議，是其事也。魏晉清談，把麈樹義，相移成俗，談玄以談經，而講經之風益盛。南北朝崇佛教，敷座說法，

本彼宗風，從而效之，又有升座說經之例。初憑口耳之傳，繼有竹帛之著，而義疏成矣」〔註 11〕，可見義疏的產生，是依照佛教講經的形式，並融入玄學論辯的元素，將彼此論難的過程記錄下來，便成為南北朝時期特有的義疏之作。南朝義疏之中，尚保有經說論辯的過程，如《齊永明諸王孝經講義》中即記載文惠太子與王儉等人的論難往來，這應是玄學論難風氣移轉到經學上的例子。自魏晉玄學興盛以來，貴族、文士間每以玄義相滯，談說的目的是在於如何取勝對手，於是論難之事時有所聞，其後南朝繼承此風，並結合佛教說經模式，形成特殊的解經型態，產生了義疏的新體例。

其次，文學、佛學對經說體例的影響，在於對音韻之學的重視。魏晉南北朝佛教興盛，佛典進入中原之時，翻譯之事往往需要採用轉讀、反切，經過長期語言磨合，反切之學便逐漸完整，四聲之說也趨興盛；又南朝文學繼承晉代以來文字堆砌之風外，更進一步強調聲韻之美，南朝文學被後世稱為唯美文學，其中重視音韻是關鍵之一。兩者交互影響之下，經注中音訓之學便逐漸興盛。自晉代以降，經說音訓的體例逐漸增多，義疏之作中也常有兼重音義的情形，如沈重《毛詩義疏》文句採偕音方式即為明證。到了南朝末期，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出現代表著南朝音訓、義訓的總成果，是繼義疏之外，南朝經說體例的一大成就。

二、禮學受到重視

如前文所論，南朝時期文、史、玄、佛諸學並興，使儒學失去其獨尊地位，並且在某些時候是極為衰微的，但在此同時，禮學卻能一反常態地受到當時人的重視，並在經說詮釋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有跡可尋的，可以分為帝王與世家兩方面的需求來作說明。

首先，以帝王來說，由於南北朝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當時在雙邊征戰之外，所謂「正統」之爭也是當時重要課題之一，秦永洲〈東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正統之爭與正統再造〉一文中，分析南北朝正統之爭的議題〔註 12〕，其中「南北政權，誰是華夏文化中心」一項，分「標榜華夏禮儀之邦」、「顯示衣冠人物之盛」、「以使者為爭正統的喉舌」三點論述，可概括說明南北朝時期

〔註 11〕 清·馬宗霍，《中國經學史》，頁 85。

〔註 12〕 詳見秦永洲，〈東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正統之爭與正統再造〉，《文史哲》1998，1。

運用經典以爭取正統的模式。南北君主各自標榜正統，華夏文化傳統的延續象徵著正統王權的繼承，這正是南北統治者所需爭取的地盤，其中對傳統禮儀的實踐正是對經典的具體落實，也是政權的重要象徵之一。南朝既失漢魏舊都，在正統之爭上失去地利，於是對南朝來說，致力於實踐禮學有其實際的需求，如此才足以與北朝互別苗頭。南朝帝王多識此理，一方面派遣使者相互往來，於機辯對答中各自強調正統；一方面則正視禮學重要，即便是不好儒學的君主，於行事舉動、禮儀典章等制度，皆本經典而作，這在當時史傳如《宋書》、《齊書》〈禮志〉、《隋書》〈禮儀志〉中可看到大量的記載，因此在當時對禮學的探討甚為深入，朝臣議禮之事時有所見。南朝君主，如梁武帝真心重視經學者固然不多，但由於政治利益的考量，使得當時的禮學普遍得到帝王的重視，這對禮學的推動有極大的幫助。

其次，禮學得以興盛，與世家大族的實際需求大有關係，世家大族在南朝時期雖同樣享有特權，但政治權力卻不同以往，有逐漸減弱的趨勢，這對門閥的發展是有威脅的，各族為求延續門族興旺，僅能在象徵意義上作努力，以保世代不衰。自魏晉九品中正以來，門閥勢力極盛，足以左右朝政，公卿之流，盡為數家所據。然自東晉以降，世家雖保有政治、社會上的特殊權力，但其政治實力已逐漸被君王所卸去，如晉元帝忌王氏之盛，用刁協、劉隗等人，至南朝時期更為明顯，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一文，即明確指出世家大族在此時的情境，其文云：「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南朝時期延續九品中正之風，士族不論朝代如何更替，表面上皆能享有政治上的特殊禮遇，但帝王在暗中卻漸漸削弱士族的勢力。由於南朝帝王皆為寒人子弟出身，雖然位居九五，但魏晉以來門閥之見已深入人們心中，帝王對士族是採取拉攏的態度，士族自然處於官宦任用的多數，帝王心中對士族多所忌憚，深怕一旦位高權重，則帝王之位不保，因此除將實際權力賦予寒人之外，對士族也多有箝制，如《南史》卷二十三〈王彧傳〉云：「上既有疾……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朝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